

现代中国文学史论丛刊

XIANDAI 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Y ESSAYS

季节轮换：

“第三代”诗叙论（修订版）

李振声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季节轮换：

“第三代”诗叙论（修订版）

李振声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季节轮换：“第三代”诗叙论(修订版) / 李振声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6
ISBN 978-7-309-06025-6

I. 季… II. 李… III. 诗歌—文学评论—中国—当代
IV. 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3464 号

季节轮换：“第三代”诗叙论(修订版)

李振声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李又顺

出品人 贺圣遂

印	刷	句容市排印厂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219 千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309 - 06025 - 6 / I • 432
定	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 言	范围,将要克服的困难,方法	1
第一章	寻根(上):价值城堡的重建或虚构	8
第二章	寻根(下):价值城堡的拆解	22
第三章	另一种向度:无需依傍或让每个人自己成为 一种文化和意义源头	35
第四章	诗意的放逐与收复:“他们”与“莽汉”现象	47
第五章	构筑诗的巴别塔:“非非”现象	65
第六章	“夕阳下的家园”:一群深度抒情者	84
第七章	智者之虑	144
第八章	既成言路的断裂	168
第九章	女性诗歌:人物与风景	183
结 语		197
附录一	背景资料或参考书目	201
附录二	坚持在差异中的写作	217
回复诗性的众多向度		225
初版后记		234
修订版后记		236

绪 言

范围,将要克服的困难,方法

“第三代”^①诗,泛指“朦胧”诗之后的青年实验性诗潮。

这段诗歌经验,是共和国诗史上变化最为激烈、频繁,投入者最为众多(除开1958年政治动员下的那场“全民皆诗”的“新民歌运动”),最容易令人入迷,也因此最容易使人感到困惑乃至失望的一段经历,其涵盖幅度异常广泛,品类也相当芜杂。

“第三代”诗,又称“新生代”诗、“后新诗潮”和“后北岛诗群”等等,对同一诗歌现象的不同命名,表明了命名者在思想、文化、价值和美学等取向上各自不同的侧重面。就像脚注所表明的那样,我选取“第三代”这一命名,只是顺从了一部分身临其境、直接置身其间的诗人们的意愿,我比较相信“春江水暖鸭先知”的说法,这就是我为什么选择诗人们的自我命名的理由。

从宽泛的意义上说,由离开“朦胧”诗之后的杨炼和江河所开启的“文化寻根”诗,也应当包括在“第三代”这一范围之内,成为我所要述及

^① 本文的“第三代”概念来源于《第三代诗会》题记:“随共和国旗帜升起的为第一代,十年铸造了第二代,在大时代的广阔背景下,诞生了我们——第三代人。”(《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第32页,1985年第1期,四川省东方文化研究学会,整体主义研究学会主办。)

的对象和内容之一，然而，由于“文化寻根”诗实际上与在其之后相继涌流的、实验意欲远为激进的诗歌思潮之间，在对待诸如文化、价值、意义以及个性的态度上，以及具体的致思方式和抒写手段上，存在着十分明显的歧异，因而，严格地说来，“文化寻根”诗其实只是介于“朦胧”诗和“第三代”诗之间的一个过渡层，也就是说，“文化寻根”诗之后的各种实验性诗歌现象，才是我想要着力论述的对象和内容。在本能的、无意识层面上，“第三代”诗的各种激进意向，实际上都是直接针对“文化寻根”诗的价值取向和抒写方式所作出的反拨和拒绝，但是在有意识的层面上，“第三代”诗却更多地对“朦胧”诗耿耿于怀、频频发难并采取一种强烈的对抗姿态，个中原因或许是基于一种自我认同上的压抑以及试图努力摆脱这种压抑的冲动，由此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化心理现象中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

虽然“第三代”诗最先是以“朦胧”诗时代和“北岛现象”的反叛者和终结者的姿态出现的，但我们仍需加以注意的是，这种反叛和所要终结的对象，仅仅是作为一种特定文化和文学现象的“朦胧”诗和“北岛现象”，作为诗人，北岛们至今仍在作着诗的深入和转换的努力，继续着诗的实验性抒写，即他们自己也已经纷纷走出了“朦胧”诗时代，这种情况构成了中国当代诗歌复杂并存而又意味深长的格局，就此而言，现在要来宣布他们中间谁谁谁已经与诗的当代性无缘，或者反过来，宣称当代诗的自觉意识和抒写只是属于某些人的专利，都不能不显得为时过早和证据不足。诗以简洁有力而又激动人心的词语、观念表述自己的时候，它能够感动每一个人，但是，对诗的那种自觉的、深入的、更为简洁有力、切入真实的企求却是永远不会完结的，因而诗永远需要重新开始，永远需要把它当作一个持续不断的智慧的成长去企求。这一事实，已经不断为那些具备真正精神创造力的诗人所证实，并且也为稍次一些的诗人们所仿效。对“朦胧”诗，北岛、舒婷一代是如此，对晚起新进的“第三代”诗作者来说，情况依然如此。

如果说“朦胧”诗面对的是作为极左政治文化附庸物存在的一种诗的废墟，那么“第三代”所面对的，却是中国新史诗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并

且直接构成“第三代”精神智慧启导人的“朦胧”诗,以及“朦胧”诗人苦心经营、建构而成的一整套相对完整、稳定的诗思规范。比起它的启蒙者和反叛对象,这种境况要求“第三代”拥有更为强有力的撞击传统和陈规的冲力,更为彻底的吸收现实生活的欲望,以及更为严峻地面对并应答诗的创造性问题。而由此导致的过于激进的变更姿态和过于强烈的震撼度,便注定了这段诗歌的命运:它们的被接受、被认同,以及从读者那里获得积极的反应,要远比“朦胧”诗来得困难。

另一种情况则表明,思想文化的生存背景,又对“第三代”诗格外地恩惠有加。“朦胧”诗的生成环境是一个充满了忧患和压抑的思想文化空间,“第三代”遇到的却是相对开放宽松的思想文化氛围。“第三代”诗人的相同之处,是在于他们都受到了当时普遍的时代思潮的鼓动、怂恿和推涌,而他们弃绝权威的躁动,同时又构成和强化了这个时代的思潮氛围,他们的不同之处,则在于他们每个人对待共同面临的时代思潮时,各自不相同的诗思素质、心理准备和特殊的处理手段。与“朦胧”诗人生成于忧患、压抑的环境之下的那种深幽、拘谨的文化性格截然不同,“第三代”诗人普遍地为一种自由感所鼓舞,为数甚众者还身不由己地将这种鼓动自己的自由感推向极端,由此导致了一种过于繁杂并且多变的精神生存形态,即企图从世界的各种(而不是一种或几种)角度和层面去理解和处置世界的意欲,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格外强烈和充分,而诗歌的表现形式总是与诗人的精神生存形态呈同构关系,与精神生存形态的繁杂多变相对应,在诗歌形式的建构上,他们深信无疑,自己业已摆脱了旧的观念和手法的限制,无须再受那些制约前代诗人的东西的束缚,因而尽可以自由地使用他兴之所至想用的任何方法和材料,谁也无权干涉他的意愿,只要他想,他就能设法做到,他甚至拥有不受可能性限制的实验特权。在1985、1986、1987 这些年头,恨不得一夜之间穷尽诗歌形式的所有可能性,曾经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风气。

这样,通常的研究惯例,很容易在它面前搁浅,因为这种惯例要求研究者始终清醒地意识到对象的整体精神特征及其风范等等,然而,想在“第三代”身上概括整体精神特征及其风范的做法,某种程度上接近于想

象性虚构，因为这样的想法从根本上背离了这一实验性诗潮的初衷和本意。被笼统纳入这一范围的诗人及其作品，在开拓诗的言词模式、诗的感觉、想象、情感、理智等诸多状态的可能性上，拥有几乎无法加以归纳、梳理的众多向度，彼此也少有衔接、贯通，甚至自身还很少保持一贯性，他们从根性上就拒绝以一种给世界以秩序的思想体系作为诗的支撑点的做法，一切听命于有意为之的反叛和独创，向迄今为止包括同代人在内的所有中国诗歌宣告自己的独立，以致一种前后一贯的相对完整和稳定的诗歌表达模式，往往与他们无缘。

干脆点说吧，不确定或晦涩难解，构成了“第三代”诗的基本品格。人们究竟应该采用哪种合适的读解方法，才能走近它们呢？这至今仍是一个远未解决的问题。事实上，“第三代”诗还从来没有能够确立起一套可以为人们所公认或普遍接受的认知规范，以便供人们得心应手地处理它所提供的那个众声喧哗的世界，它还远远没有成熟到那个份上，这似乎是它的一个弱点，因为这样一来，无疑给人们阅读、交流和明察其作为整体和过程的意义，带来种种障碍和不便，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说，这可能又是它的一个长处，正因为这样，“第三代”诗得以保全了自己无限开放的实验精神，并且有可能成为不断刺激诗学研究和批评有所拓展的动力源，因为它不再是那种只需研究者凭藉现成的思路、范畴和概念，就可以轻而易举地作出概括和得出结论的那种诗了。在很大的程度上，对它们的阅读，同时也变成了一种阅读者自我理解的行为，因为阅读者自身专心关注的耐力，他面对诗作所可能引发和唤起的复杂感悟能力，他的想象力，以及参透诗作内核的阐释能力，都将在这里一一接受测试和重新评价。

可以说，极端的个人意识，以个人的取向作为价值的直接根据，诸如此类的世界观，加上五花八门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诗学追求和私人性很强的诗风，使得“第三代”从根本上缺乏一个可以整合、统摄群伦的具有权威性的中心，有的只是各自为政、自以为是和分立割据的局面。他们在诗学和文化情绪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和差异，只是在反叛既成秩序、逃离既成权力话语这一不约而同的精神冲动之下，暂时纠合成一种松散的伙伴关系。考虑到“第三代”诗人对精神个体性怀有顽强的甚至

走向极端的信念,因而,即使在对“第三代”中某种具有群体性状的诗现象和诗经验作出勾勒和综合性阐释、评述的时候,我也将优先考虑对诗人个体性实验轨迹的关注和追踪,侧重诗作者个体性抒写的用意及其效应,包括对某些形式的功能测定及审美反应的分析、描述和适度的联想。

与此前的诗歌现象相比较,还有一个不小的差异,那就是,“第三代”诗人大多善言好辩,相当普遍地在抒写诗作的同时,亟不可待地向外人张露他们的理论构想和目标设定,这种自觉制作诗学理论的勇气,一半也许的确是出于思考和探讨的纯正冲动,一半则显然是出于哗众取宠和自我夸大的功利打算,旨在使反对者大惑不解,以及吸引追随者。因此,我的选择性描述和叙论,将尽可能地坚持以诗作本身,而不是诗论、宣言所标榜的它所能代表的目标,来作为基本和最终的依据,也就是说,是以它们的实际存在状况来判断,而不是把评论寓于预定、假设和事先承诺的完善之中。在探讨和处理设想和行动、言词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时,我宁愿把兴趣的重心偏向这两组关系的后半部分因子身上,因为我更看重的是“第三代”诗在这两对组合因子中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的裂隙。

为了急于摆脱传统和已有的经验框架给自己造成的无所不在的心理压力,“第三代”诗人们努力鼓吹原创性和独特性的绝对意义,甚至断然否认经验和实验会存在任何边界。他们向他们之前的诗所提出的最难加以反驳的质问是:这是否就是一切?如果是,那么这些诗就足够了吗?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征服这种青年实验诗现象的,不再是他们的前代所熟习和亲验过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独断专行,而是不断“创新”这一标牌和口号,“创新”为全体“第三代”诗人所无条件地慑服,力量之大,致使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有勇气和胆量去对之提出质疑乃至弃绝,这样,异化的迹象便出现了,一种本来是追求生命自由舒展的初衷或愿望,在无形之中,悄然变质为一种你不得不循守的行为规范。与此同时,刷新意识、寻觅新奇的骚动激情,导致了不稳定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到处泛滥,一种新形成的东西往往还等不到固定下来或沉淀一下,就马上陈旧了,有如沙滩上的足印,浪涛打来便荡然无存。昨日还在尊奉为“先锋”的感受和思想方式,说不定第二天醒来就已成了过时的历史陈迹。独创和实验的

轴心原则就是要砍断、丢弃过去的经验，再造自我。今日之我不复昨日之我，明日之我又非今日之我。自我失去了连贯、接续和统一的人格整体性质，一时间成了彼此断裂、分离、脱节，丧失了自信和自持，听任无休无止的偶然和随机所驱役的存在物。身不由己地听任内在连续性遭受破坏，悍然断弃自己走过来的路径，不允许已有的经验接近自己、支持和拯救自己，这一切需要承受多么大的心理痛苦呵！事实上，资质一般的人最终是承受不了这种痛苦的，即使你可以承受一阵子，估计时间也不可能坚持得太久。

人类处境的有限性，这恐怕是现代思想家和文学家们谈论得最多的话题之一了，“第三代”诗人的想象力、精神能量以及可供他们所使用的经验、意象总是有一定限度的，这个事实对于他们在创新实验欲望上的无限制的、无休止的冲动，构成了一重宿命，由此产生的生存中的无能为力感，又将导致一种厌烦和倦怠的心理状态。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既然一个人不能改变任何事物，他就自然而然会放弃当初的预期和设计。

了解了诸如此类的情况之后，我们就大可不必对“第三代”诗在不多的几年工夫之后就显得难以为继，力不从心，以及“第三代”诗人的纷纷销声匿迹或改道更辙，感到难以理喻和过度的失望、沮丧了。

不管怎么说，“第三代”诗业已构成了中国当代（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一段感性历史的不可忽略的部分，既然文学批评注定要担当起人类感性和情绪记忆以及不断反刍和回味这种记忆的职责，那么，我给我自己派定的任务就是，把往事理出个头绪来，重溯“第三代”诗的流程，仔细探讨一种诗学趣味发生、形成以及几经流变所需要的内在原因和外部条件，弄清楚作为一个时代的感性和精神生活见证的“第三代”诗，在精神、心理和感知方式等诸多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应变能力和承受能力，从而为观察一段历史、文化的变迁，理解社会 and 个人的想象、感知方式和经验特性，提供一种角度。我希望我所从事的这份工作的整个情形，就像自然界季节转换的时候，一个手持竹帚的扫叶人在庭园或路旁，静静地，慢慢地清理一茬茬落叶一样。

水落石出,山高月小,随时间的自然推移,当初充满喧哗和骚动的潮汐涌动已经渐归平静,一种激荡之余的沉淀已经形成,在浮躁和虚妄纷纷剥落之后,“第三代”中那些有着坚实内在性的诗人和显出某种内在精神智慧的诗作,正在开始得以清晰显现出来,这正是批评和研究的最好时机,也是自己开始工作的好时机。我想,我错过的东西已经够多的了,我不想再错过这样的机会了。

第一章

寻根(上):价值城堡的 重建或虚构

任何歌唱的学派,都在研读
纪念碑上记载的它自己的辉煌,
因此我远渡重洋,来到
拜占庭这座神圣的城堡

叶芝《驰向拜占庭》

……一天,我发现自己不是前进,而是返回了出发地:对现代性的寻找是一种返本归原。现代性把我引向了我的开始,我的古代。决裂变成了和解。于是我明白了,诗人原是世代之河中的一种搏动。

奥克塔维奥·帕斯《对现时的寻求》

在“朦胧”诗和“第三代”诗之间,或者说,在反叛者和它所反叛的对象之间,横亘有一个过渡性的中介层面。由于这一层面发生在“朦胧”诗之后,所以从时间上着眼,不妨把它归属进广义上的“第三代”的范围,但

实际上,它与严格意义上的“第三代”的歧异和裂隙之大,几乎不亚于“第三代”之于“朦胧”诗,这些留待后文述及。这一层面的诗歌现象,简括地说,可以参照当代小说思潮上的一个说法,命名它为“文化寻根”诗。只是需要注明,“文化寻根”现象的发生,在诗歌里要比小说中来得早。阿城的《棋王》发表于1984年下半年度,同年初冬,在杭州,阿城、韩少功、李杭育们和一批当时出名的青年批评家一起共同参加了一个小说讨论会,会上,“文化”和“寻根”成为最吸引人的话题之一。第二年春天,韩少功在《作家》(在今天已备受锐进的作家和批评家喜爱,而在当时正刚刚改刊,还不怎么惹人眼目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了《文学的“根”在哪里?》一文,正式打出小说“文化寻根”的旗号,“楚文化的彩陶到底流到哪里去了?”这一表明小说家对民族文化精神返本求源意欲的反问句,一时不脛而走。但在诗界,杨炼以古文化作为主题和背景的半坡组诗,1982年即已写成,到1984年,他已相继写出模拟《易经》思维结构的庞大、繁杂的大型组诗《自在者说》。诗的“寻根”和小说的“寻根”,时差至少为两年。

当我们说“朦胧”诗起步于一片文化废墟的时候,同时就意味着“朦胧”诗起始于一种深刻的悖论。有过那一段时代生活经验的人都会记忆犹新,我们曾经怎样以一个绝对权威所发出的鼓舞人心的绝对命令作为自己唯一的生存根据,对这权威的信仰和忠诚成为我们生活意义的全部根源,并且使得我们不必为了自身而去追寻探究任何问题。但是,当这个权威不再是成功的权威,人们对之身不由己地发生怀疑时,一种毁灭性的虚无也就随之产生了。一方面,对那种强加于人的,曾经造成亿万百姓物质和精神双重灾难的价值体系加以严正的舍弃和拒绝,就有了正当的、无可怀疑的理由,这一境况由北岛等人用“我不相信”这类悲愤而又雄辩的句式所表达;另一方面,对现存价值系统的断弃,又意味着个人由此将面临一种无处着落、无所归宿的处境,唯一能够使人逃避这种悲苦处境的,是人必须以个体的身份去占据那可以作为他的各种决断基础的真实存在。每个人和每个社会一样,都需要设法确立一套意义价值范式,以便经由它理解一个人的自我,一个人的民族、历史,以及一个人在社会、世界和

事物格局中的地位,解决精神寄托和自我反省,情感沟通和文化绵延等诸多生存问题,并且使得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得到一份合理的解释,获得一种得其所哉的踏实感和安全感,从而确保行动不再是盲目和反复无常的。但是,要求现在突然变得孤立无援的个人,去承担起在文化荒原上重建人类精神价值支柱的使命,显然是一桩勉为其难的事情。人一旦置身在荒原之中,才会真正痛切地意识到世界的荒凉和自身的无力。毫无疑问,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较为折中和可行的做法,就是急切需要设法找出一个既可靠又现成的实体,来作为暂时的支撑和立足点,以便填补人们仿佛一时被从中掏空了的那种价值虚脱,并用来应付重建新的价值体系所需要的时间上和心理上的准备。

这样,沉迷于经典的破译,复活和重现古老的岁月和种族生命,将先民们遭遇过的苦难连同他们的真诚或愚妄的信念,一起加以神圣化的处理,返身投入种族集体生命经验的渊藪之中,从而把一时漂泊无根的精神,引渡到种族信念的源头去安家落户,便成为别无选择之下的一种选择,一种可以理解和宽谅的冲动。我们在接受这种也许是极为一厢情愿的、极为主观的重建历史、重建传统的努力的时候,首先应当把这些诗人和他们的作品,看作是一批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面对困境的诗人,自我理解、自我确立精神立场的一种努力。这种困难的具体情况是,诗人们迫切想走出新的诗路,却一时又苦于找不到可以支撑自己的价值根源,那种赋予人的生存、赋予诗以某种确定性的意义来源和根因。他们迫切需要通过一种新的形式,来处置和表达他们和他们所置身其间的世界之间,已经或正在激剧改变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他们对自身感悟、理解能力正在发生着的变化的强烈感受。尽管他们找到的只是一种对当代人来说来遥远得无限陌生和陈旧的价值,为此,他们将在今后的日子里,不断承受来自新潮的批评家和诗人们的讪笑和诟病,但在当时,这些毕竟还是价值的某种形态,终究比一无所有要强。

正像在寻根小说家们那里,将福克纳、马尔克斯、博尔赫斯,这些潜心挖掘和虚构已逝岁月的神秘智慧和道德力量的西方现代小说家,尊奉为

自己的精神宗师那样,“文化寻根”诗也拥有自己仰仗的大师,他们是叶芝、T·S·艾略特、埃利蒂斯、帕斯等等。艾略特的《荒原》将异常繁杂的现代生活场景安置在远古神话所提供的互相影射的结构框架中,隐晦却深刻地探讨了现代西方文明和精神所遭遇到的困境,同时不无迟疑地表述了意欲将趋于庸俗、混乱和衰退之中的西方文明和精神,从“荒原”之境中拯救和复活的意向,他倚身于他的废墟之上,指望通过神话的方式,来抗衡当代世界的混乱和颓败,吁请一种新的文化秩序和人文价值降临,以便使世界重新获得一种整饬和整体性,这对于刚刚走出“文革”这片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文化精神的废墟和混乱的中国青年诗人,所产生的冲击和启示,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和预料。埃利蒂斯浸透了太阳的明丽和辉煌的长诗《理所当然》《对天七叹》,则表明了另外一种气度不凡的努力,那就是试图经由他的诗思,把已经旷日持久地被欧洲理性传统所曲解和湮没了的希腊文化传统,重新归还到它的本真状态。帕斯的《孤独的迷宫》《太阳石》,直至《变之潮流》,表明了这位当代拉美最杰出的诗歌大师,是如何追步欧洲象征主义对隐秘之物的追索精神,以及超现实主义是如何用诡奇的想象和语词创拓精神空间,如何擅长将个人强烈的瞬间经验、生命直觉与复杂的历史意识和人类整个文化传统,化合为博大精深的诗境的。无论叶芝、艾略特,还是埃利蒂斯、帕斯,尽管他们在文化历史背景,文化趣味,所遭遇的现实处境以及所要应答和解决的生存危机等诸多方面,存在着不小的差异,但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表明了诗的这样一种可能性:传统与现代是可以彼此打通的,历史文化可以被现代情绪和感悟所激活,而更为重要的是,古朴的文化传统作为价值的纯正源头以及天然拥有的道德力量,具有匡正现代文化和精神流弊的巨大潜能。这一切对于有着相近的文化和现实处境,尤其恰好又是拥有文明古国这一得天独厚的文化渊源的中国当代一批年轻诗人,无疑构成了鼓舞和印证的力量,加上他们在20世纪世界诗坛上的显赫名望,更是为他们在中国的年轻心仪者们的选择和努力,平添了一层令人想入非非的色彩。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这些影响中国年轻诗人的各种外来因素,估量上还得有个分寸感。要紧的还不是艾略特或埃利蒂斯或帕斯如何影响了中

国年轻诗人们的具体抒写,而在于中国年轻诗人是如何提出了自己的一种诗学观点,这种观点促成他们有可能去接纳这些影响。严格地说来,文学影响从来就不会是被动的,一个诗人决不会随意去为自己选择一种影响,只有当某种内心深处的需要、当诗人本身提出的写作立场,与这些外来因素彼此接近或契合的时候,所谓的影响才有可能发生。因而,对我们说来,更要紧的是理解诗人本身的精神立场和抒写态度。

江河也许是最先雄心勃勃地试图在个人的感觉中,体现当代中国雄大的历史文化神话容量的年轻诗人。他要求诗人所讲述的个人的心理、个人的痛苦、忧伤,他的经历,直接就是历史,就是种族或集体的传记或记忆。然而,文化寻根诗最早的行动者,也是最执迷不悟、最义无反顾者,却是杨炼。真正第一个离开“朦胧”诗时代,将自己全部的身心 and 精力,投注在历史文化的共时态经验支轴上的,毫无疑问,应该首推杨炼。

以当代人对种族生存苦难的清醒意识,开凿和逼近传统文化的沉积层面,在超出常人想象综合力的宏大时空框架中,张扬生命的强韧、绚烂和死亡的庄严、浩茫,以及由此凝聚而成的形而上意义,构成了杨炼基本的诗意内核。组诗《屈原》《半坡》《敦煌》《诺日朗》《西藏》,直至结构庞大繁杂得惊人的《自在者说》,勾勒出这个有着朝圣者般虔敬心怀和充沛精力的年轻诗人,一趟又一趟漫长、艰难而又激动人心的精神跋涉和心路历程。跋涉和游历的地域,包括从楚骚精神、易经思辨到所有被他视作生存和文化的启导性源头的实物遗址和经典文本,由此确立了他在当代诗人中无可替代的特殊位置,那就是,最强烈地觉察到了历史和文化对当代生存构成的压力和智慧性启示,从而有意识地在自己的生存感受内部去体验人类种族的精神历史,与世上一切曾经存在过的崇高事物、价值、意义达成最直接的关联。

为历史文化的某种精神所震撼,以及古老文化的深厚魅力与这块大地上正在发生的急骤进程之间潜藏着的悲剧性冲突,构成了一个属于杨炼的诗的感知和表述的世界。

人们完全有理由对步入《自在者说》时期的杨炼,表示不满或加以抱

怨,因为他似乎越来越沉溺在那种几乎无人可以弄懂的,类似于原始泛神论,并且因抽象神秘而显得冗长乏味的澹妄状态之中,他似乎只顾满足自己近于放纵无度的玄思冲动,以及造物主式的傲慢的预言欲望,到处摆出一种拯救和垂怜凡世的腔调和姿态。对于杨炼借助《易经》作为想象力支点的空旷玄奥的诗思框架,人们也会情不自禁地暗自嘀咕,这个杨炼,他到底是对炫耀自己在经典奥义方面的熟谙程度以及似是而非、大胆妄为的处理勇气更感兴趣呢,还是对诗的特质——那种只是以想象和感觉的新颖,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给人造成始料不及的精神喜悦——更感兴趣呢?《自在者说》对《易经》结构形式过于直接的套用和模拟,是否与诗人所尊重的那种《易经》的辩证原理,那种强调给事物带来生生不息的生命气韵的变化、流转,所谓“变则通”的思想,显得自相抵触呢?至于长诗对经典奥义的大胆阐发和随意推衍,其结果,是使得长诗的意蕴变得可能远比《易经》本身还要来得玄奥难解,从而不由得令人畏而却步。

与强悍的孤寂、荒芜、空旷的物象相对应,杨炼对氛围所作的凝重化处理和渲染,则导致了对于中国诗所一贯循守的雅洁、有节制、含蓄以及和美之类的规范的舍弃。杨炼有很大的抱负,或者干脆叫野心吧,他声称要把“整个世界经由诗人之手变成语言(仅仅是语言),向诗升起,注入那个横越千古的绝对空间,从而加入一切时代一切人的世界”(《诗的自觉》),杨炼所擅长的这种处置词语的方式,这种以坚定无疑的必然之手驾驭词语,专断地撕裂本来彼此连贯完整的语象,或者相反,把彼此根本无缘的物象强行扭集在一起,即对语言采取施暴性行动的结果,却造成一种涵盖吞吐量大大扩增的诗体,这种诗体对于古典的经验和物象,似乎拥有一种不受任何制约的吸摄力,并且可以尽可能包罗万象地容纳各种各样的感悟和玄思。

杨炼富有煽动力和外表狂暴的语词结构,则显然表达了这样一种隐潜着的意识困境,那便是对文明和生存的现状的失望和拒绝,他要通过对远古的幻念和狂想中,重新构筑一个能使自己有所归属的世界。正是凭藉这种施暴性的语词模式,如同造物主一样,杨炼用一种阅尽人类全部生存奥秘的智者的高傲口气,为这个世界命名或重新命名,并宣谕人们在这个